

# 巴黎的神话：作为当代中国城市镜像——读大卫·哈维的《巴黎：现代性之都》

The Myth of Paris as Mirro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es: Book Review on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by David Harvey

杨宇振

**摘要：**本文从方法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情境及奥斯曼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哈维所重构的1830—1871年间巴黎城市社会过程三方面解读大卫·哈维的《巴黎：现代性之都》，并将文本解读与中国城市现实结合起来。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by David Harvey from three main aspects: research methodology, capitalism's historic context and the historic role of Haussmann, Paris's social process from 1830-1871 reconstructed by Harvey, and combines the text reading with the urban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关键词：**资本；权力；空间生产；阶级重建  
**Keywords:** Capital; Power; Production of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Class

本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重点项目资助  
(课题编号：CDJZR10195501)

## 1 鸟瞰与游荡<sup>①</sup>

未见巴黎时，巴黎是一种想象，浪漫的情怀、梦幻的埃菲尔铁塔和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占满想象的空间。怀着这种想象，有如德·塞图站在世贸大厦顶上俯瞰纽约，笔者登上了蒙马特高地、蓬皮杜中心和阿拉伯文化中心，从各个高处鸟瞰密密细细的巴黎，试图认识和理解巴黎。从城市的高空下来，笔者也像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一样，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行走观望，在想象之外添加了一层对城市的体验。但是，马克思说过，如果每一件事就如它表面上看起来的一样，那就不需要科学了。如何才能够从观看城市到理解一个城市？怎样才能够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理解城市的运行？如何又能够穿越历史时空洞察城市的生死与转变？可惜，那时还没有阅读大卫·哈维的《巴黎：现代性之都》，只能徘徊在各个博物馆、公园和塞纳河岸，却不能有目的地遐想和踏寻1848—1870年间路易·拿破仑和奥斯曼的巴黎，现代性发端的巴黎。

《巴黎：现代性之都》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一把钥匙。关于个案城市的研究无数，但就如哈维指出的，“当中鲜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更不用说能对人类状况的理解有所启发的”。人类如果不能认识自我，又如何能够改造自我？“对人类状况的理解”始终是学术研究的核心目的之一，因此，城市研究与城市理论“不能只满足于不断解构他人的论述加工，还必须进一步将社会过程具体化”。在书中，哈维使用了他擅长的“历史地理唯物论”方法，并“坚信它是一件有用的工具，能用来理解特定时空下城市变迁的动力”；他的雄心和目标在于“重建第二帝国巴黎的形成过程，以及资本与现代性如何在特定的地点与时间结合在一起，社会关系与政治想象又是如何透过这样的结合而被启动”。

但是，城市研究的困难之一存在于“上帝”与“凡人”眼睛的差异中，存在于塞图的“鸟瞰”与本雅明的“游荡”之间。如何能够见远又洞微？如何在整体中贯彻细节？又如何在无数细节的关联中不失去整体感？哈维指出，“我们有丰富的理论来处理城市‘当中’所发生的事，唯独缺乏的是城市‘本身’的理论”；他问道，“如果未对巴黎内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运作和互动有适当的理解，又怎能完整地描述这段转变的过程”？由此，他提醒读者，“在理解主题时要心存整体视野，整体中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构成特定时空下社会转变的驱动力量。”

① 下文中哈维的相关论述皆引自该书，不另引注。

作者：杨宇振，工学博士，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yuzhenyang@cqu.edu.cn

参照卡尔·休斯的《世纪末的维也纳》，哈维认为，理想的城市研究应“透过城市中的物质生活、各种文化活动、思想模式等多样的视野来传达城市的整体感”，而“最有趣的城市写作通常要兼具片段与整体”。

## 2 偶然与必然

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空间载体，城市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历史的偶然还是一种必然？为何出现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对于生活其中的人们的意识与日常生活又带来怎样的影响？不同阶层的人又如何表述这种变化？或者说，对于人类的状况产生了什么冲击与作用？然而，这样的询问似乎过于抽象。新井一二三在《东方既白》（《万象》2009年12期）中比对了20世纪80年代和现在的上海，1987年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上海和如今欲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试比高的蒸腾上海，感慨这是一场革命，而文中有意无意地将城市进行了“红”与“白”的比对。这一“革命性”的变化是历史偶然吗？

第二帝国的巴黎是现代性发端的巴黎，充满着“创造性破坏”的巴黎，被开肠破肚的巴黎，当之无愧的开膛手当然是充满着浓厚马基维利气质的奥斯曼男爵。但是，在哈维看来，第二帝国的巴黎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在特定时空的必然。

哈维谈到，第二帝国巴黎受到了最为广泛且深度的资本危机影响。资本主义到1848年已经趋于成熟；金融状况、鲁莽的投机以及过度的生产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鸿沟。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同时感受到相同的危机，很难将其归咎于单一国家的政府失灵。哈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过度积累所造成的危机，资本与劳动力出现了大量剩余，形成难以有效产生剩余价值的困境。1848年，到底是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改革还是以革命推翻现行体制，选择已经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老旧的社会结构支配和制约着制造业、金融业、商业、政府以及劳动关系，并限制着这些活动与实践的城市物质空间——巴黎已经无法有效满足苛刻的资本积累新条件。如何才能冲破这一旧有社会与物质空间结构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的牢笼？

哈维回顾了1830—1848年间巴黎社会各界对于政体的想象与实践。这一时期出现了包括圣西蒙、普鲁东、傅立叶等在内的各种路线论战，思想界动荡不安，各种视野与空想纷纷入笼；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思想与政治上都开始成型。许多乌托邦思想家和理论家，都试图找出重建巴黎的方法。然而1848年之后，占有巴黎的却是奥斯曼、土地开发商、投机者、金融家以及市场力量，他们按照自己特定的利益与目的来重塑巴黎。1848年2月，对政府小规模抗议终于

演化成为社会内部高度压力的释放阀，在巴黎的大街上堆积着尸体和流淌着无数人暗红鲜血之后，最终导致了路易·拿破仑的上台和第二帝国的来临，一个新时期降临。

哈维认为，第二帝国试图建立一种混合的专制独裁，对私有财产和市场尊重，同时加上拉拢民心的种种现代性举动；它粉碎了1830—1948年间关于政体的各种想象（包括流行的浪漫主义与社会乌托邦主义），它的历史就是一段围绕皇权来重构政体以面对资本积累力量的历史。然而，路易·拿破仑必须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如改革与现代化、控制劳工运动及其诉求、发展经济，以及让法国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病症中恢复元气。更为棘手的现实是，在这一重建的过程中，国家应实行怎样的社会实践、制度架构等，一切均不十分清楚。国家又在私人利益与资本流通上扮演什么角色，国家对于劳动市场、工业和商业活动、居住与社会福利能够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进行干预？而最难处理的政治问题，在于如何既要保持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够在各个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与工人）的利益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以取得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权的稳定。这不由让我想起不久前新上任的韩国总理郑云灿在就职新闻发布会的宣言——“建设经济强劲的团结国家”。资本的流动（作为经济强劲的表现）、原有社会结构的瓦解与重建（怎么样能够团结和谐）、权力的合法性始终是贯穿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

哈维进一步论述到，第二帝国是一场严肃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验，它是同时拥有警察力量和民意基础（路易·拿破仑当政是民选的结果）的独裁国家。第二帝国必须适应急速发展和需索无度的资本主义。然而，其中深藏着国家权力与资本流通的尖锐矛盾；经济自由化逐渐侵蚀着皇权，权力的合法性再度受到挑战。对于巴黎的开膛手奥斯曼而言，他必须动员的力量就是资本的流通——用来转变巴黎内部空间结构的公共工程，吸收过剩的资本与劳动力，进而促进资本的流通。哈维谈到，如果帝国要续存，就必须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即哈维发展了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出的资本的第二回路的论点）。然而脱离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之后，资本便按照自己的原则重新组织巴黎的内部空间。奥斯曼梦想将巴黎塑造成法国的现代之都，然而到最后他只成功地让巴黎成为资本流通掌控一切的城市。巴黎逐渐蒸腾和散发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气息——一个现象是，奥斯曼、马克思、福楼拜以及波德莱尔全都是1848年之后才锋芒毕露。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当然，哈维也描述了特定时空中的奥斯曼的个性特征。奥斯曼胸怀野心，醉心权力，热情投入，以长期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亦极度爱慕虚荣。他拥有皇帝授以的重权，精力充沛，组织力强，一丝不苟，但向来轻视别人的意见，

一意孤行，甚至反抗权威（即使是皇帝的命令）；更为关键的是，奥斯曼善于在财政政策上创新，能够持久地与各种地方性的私人利益集团奋战，巧妙地悠游于各派之间，并以杰出技巧稳住摇摇欲坠的权力。哈维描述到，“奥斯曼巨塔般的身影在第二帝国时代支配了整个巴黎的政府机制”。然而，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第二帝国史无前例的“创造性破坏”历史过程中，是奥斯曼成就了巴黎，还是巴黎成就了奥斯曼？哈维认为，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伟大传奇。但真正使得奥斯曼成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鼻祖之一的，正如多年以后大洋彼岸的丹尼尔·伯纳姆所高声宣扬的“不做小规划”（是现代性的一种空间传播和转移吗？），乃在于宏大规模与规划和概念的复杂性；而其中当然贯穿着奥斯曼无情的执行力、不可思议的精力和行政能力。

### 3 巴黎的理论：重构社会过程的城市历史地理学

哈维在开篇的《导论：现代性作为一种断裂》中谈到瓦尔特·本雅明与亨利·列斐伏尔，谈到他们深刻地洞察到，人们不只是生活在物质世界中，人们的想象、人们的梦、人们的概念与表述也以强有力的方式调制着物质性。因此，本雅明与列斐伏尔都对于景物、表述以及如梦境般变幻不定的景象有着浓厚的兴趣。

不仅对于资本流通与积累以及阶级关系有着“无所不在”的关注，哈维对于人们的“想象”与“表述”一样有着浓厚兴趣。哈维一开始即用巴尔扎克文学世界中的巴黎——作为一种城市的经验、想象与表述——来重新想象与阐释1848年之前、处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巴黎，同时大量引用了杜米埃讽刺性和批判性的绘画作品以及波德莱尔、左拉等关于巴黎的犀利文字。哈维认为，巴尔扎克最大的成就，在于细致地解开并表述了藏匿在资产阶级社会子宫中的社会力量；他揭开了现代性的神话面纱，不可思议地预测到一种在1830—1840年代还处于难以觉察的、“胚胎期”的现代性；透过巴尔扎克的作品，巴黎的辩证过程与现代巴黎的构成被赤裸地展现出来。借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部写作于1828年到1850年间的卷帙浩繁的作品集，哈维重构了巴尔扎克的社会理想、巴黎的城乡关系、投机的资本流通、社会的阶级构成、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关联以及人们对于这种时空变化的感受。哈维认为，巴尔扎克需要巴黎来滋养自己的想象空间，却想要号令、穿透和分解巴黎；奥斯曼则将幻想的驱动力转化成具体的阶级计划，在表述与行动的技术上交由国家与金融家来领导。

笔者很感兴趣的是此中的末节“拜物教与游荡者”。拜物教是一种宏观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存逻辑；而游

荡者带着狡黠的眼光，是企图挖掘社会关系秘密的观察者，是试图超越和逃离拜物教的行动者。哈维论述到，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具有真实基础，并非出于想象。人们藉由生产与流通各项物品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透过物质来促成社会关系）。这些物品也暗示着某种社会意义，因为它们是社会劳动与有目的人类行动的具体成果（物质具体显示并表述了社会关系）。对马克思来说，不可能逃离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因为这正是市场运作的方式。马克思因此认为，分析者的任务乃是超越拜物教、穿透表象，更深入理解规范社会关系演进与物质结果的神秘力量。人们无法抹灭商品拜物教（除非透过革命），但可以面对并理解它。然而，如果人们单以表象来诠释世界并且在思想中复制商品拜物教，那么永远无法摆脱危险。哈维进一步指出，人与人的物质关系无所不在，社会关系便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各项物品之中。任何物质的重新制造都将造成社会关系的重新排列；在建造与重建巴黎的过程中，人们也建造与重建了自我，不管是一个人还是集体。

因此，哈维把巴黎城市空间关系的物质性及社会影响置放在整个分析的核心。他坚定地认为，任何外部和内部新型空间关系都是从国家、金融资本和土地利益的结盟中创造出来的，在都市转型的过程中，每个部分都必须痛苦地进行调整以配合其他部分。哈维阐释到，社会过程中技术、组织和位置的各种变化与演变中的各种空间关系（如出现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与巴黎城市内部空间关系的重组），以及信贷、租金和国家政策联系在一起。由此，他进一步讨论了第二帝国时期与资本流通和积累紧密相关的金钱、信贷与金融以及租金与权属，来说明逐渐强大的金融资本是如何与地产资本结合在一起，来改变巴黎的空间结构。当然，哈维不会忘记讨论国家在资本流通与社会控制中的作用，集权与分权，以及权力试图在日渐不满的各个阶层中取得平衡的努力。尽管权力试图满足大多数阶层的利益，然而资本积累带来的贫富差距造成阶级间的鸿沟日深。权力只要往一方挪动一步，势必造成与他方的疏离。1871年，一场新的暴风雨终于来临。哈维说道：“奥斯曼的独裁做法其实与他身处的环境有关……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奥斯曼不可能坚持到自由主义的帝国……真正的风暴并非奥斯曼所创造，也非他所能驯服。它是法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下所产生的深层骚动，这个风暴最终将奥斯曼抛弃，其冷酷程度与奥斯曼当初将中古巴黎交给拆除工人如出一辙”。

在分析资本、权力以及空间结构与形态的相互影响之后，哈维接着阐释第二帝国巴黎的生产、消费与社会过程。生产包括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劳动力的买卖与再生产以及妇女的状况。消费方面，哈维试图阐明的是巴黎如何透过消费

结构与景观结构来再生产阶级关系并对阶级关系进行社会控制。社会过程讨论了这一时期巴黎的社会结构、各种不同的团体与阶级、城市与自然的关系、科学与情感、现代与传统以及处在这一时空中人们的意识建构和对于自我与他人的表述（一种对于世界的体验、理解和意义的传达）。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哈维指出，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工人与资产阶级都聚集起来要求保卫秩序，但他们心里所想的“秩序”一词却很不相同：工人要求保存他们的技术（以保证个人和家庭的生存与再生产），地主与银行家则要求保护他们的财产权——相同的词汇明显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因此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正确地诠释这些意义。然而，对这些意义的讨论却因政治压制与检查制度变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当私人的表述成为公众的说辞时，这些表述成为了个人与集体行动的方向；由此表述的通道不仅成为权力控制和监管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各种力量激烈斗争的领地。当然，哈维最后不会忘记提到，“我们还要补充另一个范畴：沉默的大众——我们无法追溯沉默大众的观念，却能追溯他们策略性的沉默。”

从资本的积累与流通、权力的运行与面临的复杂问题、社会的组织与过程、空间关系以及各种人群意识形态等的复杂关联中，哈维建构了第二帝国物质的、社会的以及想象的立体巴黎。然而这种历史与地理运动是动态变化与激烈斗争的过程。哈维谈到，在一个全球化的复杂关联中，空间关系的剧烈变化改变着人们原本的时空视野；市场中来自各地的商品的不断涌现与混杂，每日都造成空间关系的变化。对于巴黎人而言，无需离开巴黎，就能体验空间关系转变的震撼，然而内心的世界必须调适并学会认知当下全球政治经济活动地理空间的变动与“他者”的世界；这意味着要顺从市场中物的交换所隐匿的社会与空间关系。在这一作为个人体验与社会现实的“时空压缩”历史过程中，动态的运动和斗争逐渐积累社会压力，从1860年开始，便显露端倪——正如1830—1848年间出现的各种阶级对于政体的想象与实践，最终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暴乱中爆发，法国从而进入第三共和国，迎来了又一个新历史时期。对于这一过程的阐释，如哈维自己指出的，是螺旋推进的、活生生的巴黎城市历史地理的建构——是有趣的、有助于理解现代人类社会的城市写作。

#### 4 巴黎：作为中国城市镜像

如何理解1978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中国城市？

哈维在多处谈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前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开放获得了一种危机转移的地理空间。在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全球现实中，近30年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当代

资本主义流动性与中国城市社会互动的过程。作为历史与地理的机缘，东部沿海城市首先加入国际劳动分工，成为全球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组成。然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曼纽尔·卡斯特曾经谈到，对于中国，资本主义需要的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更是有着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资本试图穿透地方性的社会（作为一种空间障碍）来建立自己的流通网络。30年的历史，生产（中国制造）和消费领域加速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流通空间（其中伴随着愈来愈重要、也存在巨大风险的金融变革），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与流动。

在与外部巨变互动的过程中，物质空间形态，从区域格局到建筑形态都产生了结构性变化，来满足资本加速流动的需求。巨大的不平衡显现在各种空间层级中，然而却存在一些普遍现象：区域间与城市中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内部空间结构的重组以及形态的剧烈变化、房地产市场的高度投机、工业被逐步驱赶出城市核心区、郊区的城市化以及建筑形态的奇观化与平庸化（商品化的过程）等。所有层级的物质形态变化都显现了资本主义对于空间与空间互联的要求：大、更大、再大，与快、更快、再快。

国家在资本的流动中改变着角色与作用，然而一切并不十分清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权力逐渐面对各种日趋复杂和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流动性对于地方社会的解构，进而威胁到权力的合法性——与100多年前路易·拿破仑建设第二帝国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没有根本不同。权力内部本身也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国家与城市、中央与地方不再仅仅是原来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在各个方面逐渐演化出作用力强大的博弈（比如，特别突出地体现在分税制、在土地作为商品的使用方式与权限上）。在向上负责制中同等级城市之间的竞争加上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成为推进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地方性力量。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将这种模式称为“新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混合的中式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工业资本、地产资本与金融资本，形成了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及其相应的各种权贵阶层，这些权贵阶层正成为权力必须小心翼翼平衡的对象。当然，不仅仅是权贵阶层，还有沉默的大众，最大多数的人。

最少数的人终于在私有化与新形态的国有化过程中先富起来，带动了全民对富有的热切欲望——在商品拜物教无所不在的强制逻辑中，亦是个人和家庭一种生存和再生产的必须。社会阶层开始产生严重分化与空间区隔，作为原有福利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单位制”居住单元（以分配、注重使用价值为主要形式）逐渐被“小区”（以市场、注重交换价值为主要形式）所替代；和清末民初以来若干个动荡的社会时期相比，在热切追求资本的状态中，社会理想基本黯淡无光、公共讨论几乎失声。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将雇佣一切人群，

使其成为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部分，更将各种人群异化成商品。人成为商品的目的是追求交换价值，因此无论是早期的“价格双轨制”还是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的中式道路”中，都产生了严重的权力寻租。权力寻租直接的后果不仅是权力阶层富贵化的过程，本身同时也是一种各阶级重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空间中弥漫着无所不在的斗争，清晰地显现在基层的中、小城市中：黑社会猖獗、群体性事件频发、公共利益被随意挪用和占用等等。为防止潜藏汹涌暗流的井喷，一方面必须加大对社会的监察和监控（特别包括作为传播工具的、潜在着巨大危险的媒体和互联网）；另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于早期放弃的公共福利和服务的投入，试图收回这一领地。然而，在一个已经阶级化的社会中，任何向弱势群体投入的公共财政都将遭遇权贵阶层（作为执行者）的“利益渗析器”；这一过程将扩大阶级间的鸿沟而不是相反。

城市是资本积累与流动、政府作用与对社会的调控、社会阶级力量重建这三者矛盾冲突最集中、最剧烈的空间。米歇尔·福柯曾经说过，18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中城市的许多问题，以及应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已经成为权力统治的模型而施之于整个国家；1970年列斐伏尔指出，长期的全球化正在进行，城市的问题、生活方式和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都是全球性的现实，城市革命是全球化的现象。此时此刻，

中国的城市过程正是全球城市革命的一种表征。如何理解这一表征？如何洞察这一影响甚至可能左右世界未来发展和人类自身状况的表征及其深层机制？哈维在《巴黎：现代性之都》的城市研究、理论建构与写作中体现出来的阐释能力十分值得借鉴与学习。同时，现代性发端的第二帝国巴黎正可以成为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的镜像，既遥远又贴近现实。[UP]

#### 参考文献：

- [1] De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2] Lefebvre Henri.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 [3]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OX, UK; Cambridge, Mass., USA: Blackwell, 1991.
- [4] Harvey David.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Routledge, 2006.
- [5] Harvey Davi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 [6] 瓦尔特·本雅明. *巴黎，19世纪的首都*. 刘北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7] 卡尔·休斯. *世纪末的维也纳*. 李峰，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8] 曼纽尔·卡斯特. *千年终结*. 夏铸九，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9]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10] 杨宇振. *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1908—2008*. *城市规划学刊*, 2009(1).

(上接 98 页)

- [78] Rohe, W. M., Bratt, R. G., & Biswas, P. (2002). *Evolving challeng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The causes and impacts of failures, downsizings, and mergers*. Chapel Hill, NC: 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 [79] Rohe, W. M., & Gates, L. B. (1985). *Planning with neighborhood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80] Sanders, H. T. (1980). *Urban renewal and the revitalized city: A reconsideration of recent history*. In D. Rosenthal (Ed.), *Urban revitalization* (pp. 103-126). Beverly Hills, CA: Sage.
- [80] Sanders, H. T. (1980). *Urban renewal and the revitalized city: A reconsideration of recent history*. In D. Rosenthal (Ed.), *Urban revitalization* (pp. 103-126). Beverly Hills, CA: Sage.
- [81] Schneekloth, L. H., & Shibley, R. G. (1995). *Placemaking: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communities*.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82] Scott, M. (1969). *American city planning since 189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83] Silver, C. (1985). *Neighborhood plann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1 (2), 161-174.
- [84] Sirianni, C. (2007). *Neighborhood planning as collaborative democratic design: The case of Seatt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3 (4), 373-387.
- [85] So, F. S., Mosen, D. R., & Bangs, F. S., Jr. (1973). *Planned unit development ordinances* (Planning Advisory Service, Report No. 291). Chicago: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ning Officials.
- [86] Solow, A. A., Ham, C. C., & Donnelly, E. O. (1969). *The concept of the neighborhood unit*. Pittsburgh, PA: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87] Southworth, M. (1997). *Walkable suburbs? An evaluation of neo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t the urban edg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3 (1), 28-44.
- [88] Stoecker, R. (1997). *The CDC model of urban redevelopment: A critique and an alternative*.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19 (1), 1-22.
- [89] Teaford, J. C. (2000). *Urban renewal and its aftermath*. *Housing Policy Debate*, 11(2), 443-466.
- [90] Twelvetrees, A. (1989). *Organizing for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Brookfield, VT: Avebury.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2008).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LEED for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Retrieved February 19, 2008, from <http://www.usgbc.org/ShowFile.aspx?DocumentID=3357>.
- [91] Vidal, A. C. (1992). *Rebuilding communities: A national study of urb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New York: Commun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92] Von Hoffman, A. (2000). *A study of contradictions: The origins and legacy of the Housing Act of 1949*. *Housing Policy Debate*, 11 (2), 299-326.
- [93] Warren, R. (1978). *The community in America*. Chicago: Rand McNally.
- [94] Wheeler, S. M. (2008). *State and municipal climate change plans: The first gener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4 (4):481-496.
- [95] Wilson, J. Q. (1966). *Planning and politics: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urban renewal*. In J. Q. Wilson (Ed.), *Urban renewal: The record and the controversy* (pp. 407-421). Cambridge, MA: MIT Press.